学术动态

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黄爱平

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和友谊宾馆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共110人，其中内地学者99人，海外学者11人，既有戴逸教授、李文海教授、龚书铎教授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专家，也有许多思想活跃、功底扎实的中青年学者，还有从事各个专门领域研究的人才。可谓基本囊括了国内外学术界相关学科领域研究有素、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西学与清代文化”。围绕这一主题，与会学者踊跃撰稿，提交大会的论文包括部分提要在内，达80篇之多，内容涵盖了历史、哲学、宗教、美学、音乐、绘画、陶瓷、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地理等各个方面。其作者队伍之整齐，论文数量之宏富，涉及范围之广泛，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概括而言，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下问题。

一、中西文化观

自明代末年以利玛窦为首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入华传教，并以其特殊的身份打开中西交往的窗口之后，东方和西方便开始了初步的接触和了解，也由此而产生了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和冲突。就此而言，提交本次会议的多篇论文，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阐发了中西文化观念的有关问题。

李华川《清朝中前期国人对法国的认知》、王宪明和张伟良《两个法国人三个中国人，与18世纪法国两种中国观的形成》两篇论文，为我们提供了清代前中期中西交往中极富典型意义的个案。康熙乾隆年间，先后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有数十位，他们或服务宫廷，或在地方传教，与中国的统治者上层乃至一些平民百姓都有所接触。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士大夫对法国这个欧洲大国仍然关注不够，认识粗浅，甚至误解。李华川的论文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民国初年成书的《清史稿》，在其中的《邦交志》中，竟然将法兰西与佛郎机（葡萄牙）二者相混淆。而这一混淆直接源于乾隆时期官修的两部政书《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通典》，并且，同一时期撰成的《皇清职贡图》、《澳门纪略》等书，也都出现了同样的讹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世纪的法国社会和思想界对东方的中国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非同寻常的关注。王宪明和张伟良的论文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法国的两位思想家孟德斯鸠和魁奈，在探讨欧洲政治社会改革方案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国，希望从中国找到欧洲社会发展的出路。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迥然不同：孟德斯鸠把中国当成欧洲的反面典型，魁奈则把中国当成欧洲应该仿效的正面典范。而在二者争论的背后，“都有着与中国人直接交往及受此种交往影响的痕迹”。这就是当时旅居法国的三个普通的中国

[收稿日期] 2006-10-15
[作者简介] 黄爱平（1955—），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人：黄日升（教名黄嘉略）、杨德望和高类思。显然，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于18世纪的中法交往和中西互视，双方之间的天平可以说是完全不对称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反差，并非偶然，诚如李华川文中所言："或许更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世界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真正触动国人的日常生活，即使有少数人如康熙帝对西方势力有所警惕，预料到'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却也以为那是未来很遥远的事情。他们觉得，与现实中的问题相比，西方的威胁还太不重要。没有人想到，百余年后，祸患就已降临。"应该说，这样的个案比较分析，是颇有意义和深度的。

其他如王先明《晚清"中体西用"论的再思考》，周武《从中西之学到新旧之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西学传入及其对中国学人和学界的影响，揭示了晚清时期西学观的变化。李纪祥《近代观与西学观——魏源研究的多元面向与反思》，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姜义华《清末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西学渊源——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的一项审察》，则对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三个人物，即魏源、梁启超和孙中山，作了重新审视和进一步的探讨，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西学与清代学术

传教士东来之后，在中西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和冲突中，一方面传教士逐渐适应并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的科学文化又对中国的传统学术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对此，提交会议的各篇论文，从不同的领域，探究了西学与清代学术的关系。

以经学为例。张昭军《"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跨文化诠释》，考察了传教士基于宗教立场对程朱理学有关命题所作的诠释。如否定"太极"、"理"等理学核心范畴的本原性和本体性涵义，而将其诠释为万物之"性理"和天主赋予人的灵魂的"天理"，甚至直接诠释为天主本身。显然，这样的诠释只是从天主教立场出发所作的想当然的附会，并不符合程朱理学的理论体系和真实情形。但是，"历史的跳动有时恰恰是在这种似是而非中完成的"，作者认为："传教士对理学的诠释和传播在东西方社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俞祖华、胡瑞琴《晚清西方传教士对儒学的认识》，则分析了晚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儒学的认知。他们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着眼于上帝观、自然观、人性论、伦理观、礼俗观等方面，把儒学与基督教加以比较，由此而形成了传教士的儒学观。作者认为，作为异域视野下的比较文化论和宗教视角下对世俗政治伦理思想的观照，传教士的儒学观"对我们审视儒家文化的价值与局限，在视角、宏观把握、具体分析、中西比较等方面都有参考意义"。

再就史学而言，许明龙《关于冯秉正〈中国通史〉中的清史部分》，张先清《乱世文章——多明我会传教士与清初华南地方史书写》，贾建飞《19世纪西方的新疆研究及其与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关系》，邹振环《〈泰西新史览要〉："世纪史"的新内容与新形式》等论文，则着眼于西人或西学的视角，分析了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笔下的清史和地方史，以及西方史著对中国史学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

三、传教士与宗教问题：传教与禁教

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就其根本目的而言，是要在东方传播上帝的福音，由此而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诸多的碰撞和冲突，传教与禁教以及相关的宗教问题也相应成为本次会议学者感兴趣的课题。

崔维孝《方济会石铎禄神父〈初会问答〉刍议》，深入探讨了方济会传教士石铎禄所著《初会问答》一书的有关问题。《初会问答》是继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之后，又一部以问答形式来宣扬、传播天主教的中文书籍。作者在将二者加以比较的基础上，认为该书更多地吸取中国文化的元素来论证天主的存在，批驳中国各种宗教与偶像崇拜学说，阐释天主教的教规和教义，再加上简练的语言文字和多元

的修辞方法，使得该书成为方济会传教士在华出版的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宣讲天主教义的著作，同时也受到其他修会传教士的欢迎和使用。高王凌《刘松龄，最后的耶稣会士》，利用斯洛文尼亚学者近年来新发现的材料，对乾隆年间来华并长期任职钦天监的奥籍传教士刘松龄其人其事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如龚缨晏、陈雪军《康熙"1692 年宽容敕令"与浙江》，黄爱平《从清代档案看雍正乾隆时期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集中探讨了康雍乾年间传教与禁教的有关问题；孙江《作为他者的"洋教"——关于基督教与晚清社会关系的阐释》，则详晰阐述了基督教与晚清社会的复杂关系。

四、科学、艺术与西学

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是传教士用于传播上帝福音的辅助工具。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天文、数学、物理、医学、地理、建筑、音乐、绘画、机械制造等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也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对此，与会学者也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以天文学为例。在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中，天文学的地位最为重要，中国士大夫的认同程度最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最大。江晓原《欧洲天文学在清代社会中的影响》，考察了清代在历法和皇家天学方面任用西人、采用西法，天文学研究空前繁荣，由此而导致"用夷变夏"与"用夏变夷"的争论等相关情形，作者认为，天文学是古代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殊神圣地位的学科，"正是在天文学的旗帜之下，一系列西方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在明清之际进入中国，其中有些确实被接受和采纳，并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再就机械制造而言，对中国社会颇有影响并得到各阶层广泛应用的当推西洋钟表的传入和制造。汤开健、黄春艳《清朝前期西洋钟表的仿制与生产》，在广泛系统搜集中西文献、档案及前人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清代前期江南、福建、广州、北京等地西洋钟表仿制与生产情况作了详晰的考察，认为："清朝前期，西洋钟表的传入仿制及一定规模生产的出现对于中国机械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钟表工业的形成仍然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而产生的'西洋钟表消费热'及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洋钟表的认同，则对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接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他如沈定平《西洋铜版画在清宫廷的流传及其影响》，详细考察了铜版画及其技法在清代宫廷的流传情形；刘潞、郭蕾《清代广州十三行艺术》，则主要讨论了广州因十三行的活跃及粤海关的成立而出现的本土艺术品，如广式钟表、广制紫檀家具、珐琅玻璃牙雕工艺及广东彩瓷与外销画等。

五、西学与中国近代化

西学传入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对此，与会学者从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作了深入的研讨。

以学术为例。中国近代学科的建构以及近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的生成，都离不开西学的传入和影响。章清《"西学门径"之辨与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探讨了晚清知识界在接纳西学过程中重视学科次第亦即"门径之辨"的问题，认为："围绕学科次第的论辩，或围绕'西学门径'的探讨，关乎'采西学'的基本方针，多少预示着晚清对西学的取舍，也主导着中国本土学科建制的规划，值得当作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重要一环加以审查。"王晓朝《从明清天主教文献看中国近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的生成》，分析了西方文字中系动词"是"传入中国对汉语的影响，认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促使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促成了汉语'是'字从用作实义动词转化为以系动词用法为主的重大变化，为汉语的变迁和中国近代思维方式的生成奠定了基础"。王天根《严复与近代学科》，探讨了严复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下建构近代学科的过程、内容及其特色；郭双林《晚清驻外使领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则论述了晚清

时期驻外使领人员在建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作用。

区域研究，也是探讨西学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栋《环球化、区域化及其超越“西方与非西方”模式：从岭南档案沉思中美文化相遇》，魏白蒂《初探清末民初美国基督教士背景及其早期在南京活动与金陵大学创起》，李金强《西学摇篮——清季香港双语精英的诞生》，李长森《澳门土生葡人与中国近代外文报刊》等文，分别着眼于某一地域，从中西文化相遇之后的某些具体内容和实际操作层面入手，探讨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生长点的有关问题。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与会学者对研究的检讨和方法论的反思。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优秀的海外汉学研究论著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启迪了学者的思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研究方法。就如何正确吸收和借鉴国外汉学研究成果的问题，学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王俊义《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针对美国著名汉学家本杰明·艾尔曼教授提出的观点，即乾隆时期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之说，以确凿的证据和细密的考证，说明了庄存与与和珅之间并未形成对立和冲突，其研治今文经学亦与和珅无关。由此，作者特别提出，对待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既要勇于吸收，又要善于吸收。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则对近年来国内外日趋兴盛的“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的史学思潮，即“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是如何从社会生活、市场经济、政治制度、民族国家等各个方面建构 18 世纪中国所谓的“现代性”这一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两篇论文视角各异，研究对象也不相同，但都发人深省，足资参考。

本次会议的学术研讨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多元视野的研究和探讨

提交会议的各篇论文以及会上的交流讨论，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对“西学与清代文化”这一主题所涉及的诸多问题，作了有深度、有新意的研究和探讨。有的侧重中西文化观的比较和阐发，有的着眼于西学与清代学术的关系，有的集中探讨传教士以及与之相关的传教和禁教问题，有的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专门研究，有的重视西学与中国近代化的有关问题。这种从多元的视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探讨同一主题的做法，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整合趋势。

其二，研究领域的拓展

本次会议的论文，有不少关注到前人较少涉及的领域，研究多有开拓和创新。如音乐学，郑锦扬《西乐与清乐：西学与中国文化关系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着眼于宏观的视角，对清代西乐的传入及其与清乐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又如美学，黄兴涛《清代西方美学观念和知识在华传播考论》，则依据相关文献史料，从观念史、知识史的角度，对西方美学在华传播的有关问题进一步作了深入的考证和论述。

其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

以往的学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之间，往往相互脱离。而在本次研讨会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领域的学者得以相互切磋，共同交流。如罗见今《从清代无穷极数发展的历程看西学的影响》，余新忠《晚清“卫生”概念演变探略》，张大庆《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外科学的传入——以合信的〈西医略论〉为例》，都在中西交往的大背景之下，分别探讨了清代数学、医学等专门领域的问题，不仅深化了各个专门领域的研究，而且对其他学科专业也颇有裨益。

其四，新的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利用

在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中，有不少发掘和利用了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如华林甫《英档庋藏近代中文舆图的价值》，介绍了位于英国伦敦西南郊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 124 幅近代中文舆图的详细情形，揭示了其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其他如相关外文资料、新近出版的清代档案以及翻译的传教士书简，学者也多有发掘和利用，大大提升了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